

【特约稿·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

DOI:10.13467/j.cnki.jbuss.2019.01.003

《春秋》经传的研究思路与特色^{*}

——张高评教授访谈录

张高评,邱诗雯,张瑞麟

(成功大学 中国文学系,中国 台南 701)

[摘要]张高评教授研治《春秋》《左传》四十余年,出版相关专著九种,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前三十年,张教授大抵着力于《左传》文本之探讨,先后从古文义法、以史传经之视角,考察《左传》之文学价值,以及《春秋》书法之运用;近十年来,张教授掌握属辞比事之要领,诠释孔子《春秋》之微辞隐义,对于中国叙事传统之脉络,尤有正本清源之提示。为传播学术,沾溉后学,特就《春秋》学一题访谈张高评教授,以飨读者。

[关键词]《春秋》;《左传》;古文义法;以史传经;叙事传统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9)01-022-10

张高评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国家文学博士,曾任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特聘教授(连续四任),兼文学院院长、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学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访问教授,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兼主任,现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禹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成功大学名誉教授。学术专攻为《春秋》《左传》《史记》、秦汉文、唐宋诗、诗话学、古文义法、叙事传统。已出版《左传导读》《左传之文学价值》《左传文章义法撷微》《左传之文韬》《左传之武略》《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属辞比事与〈春秋〉诠释学》等《春秋》《左传》学术论著9种;《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宋诗之新变与代雄》《宋诗特色研究》《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自成一派与宋诗宗风》《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创造造语与宋诗特色》《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风之

异同》《唐宋题画诗及其流韵》《宋诗特色之发想与建构》等宋诗论著11种;《诗人玉屑与宋代诗学》《苕溪渔隐丛话与宋代诗学典范》《清代诗话与宋诗宋调》等诗话学论著3种;《论文选题与研究创新》《研究综述与论文选题——以《春秋》《左传》《史记》、宋诗、诗话为例》《临场智慧与论文写作》(2019年出版)等治学方法专著3种;《黄黎洲及其史学》一种;《唐诗三百首鉴赏》(与黄永武先生合著)、《古文观止鉴赏》(上下册)科普读物2种。张教授主张提倡实用中文、致力创意研发,尽心于中国叙事传统之探究,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论文集20余种,主编学术期刊3种。曾执行“国科会”(台湾“科技部”)专题研究计划23案,荣获优等奖一次,甲种奖6次。《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创造造语与宋诗特色》,荣获台湾“国科会”人文研究中心出版奖助。《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荣获成功大学出版奖助。《宋诗特色研究》(长春

* [收稿日期]2018-11-28

[作者简介]张高评(1949-),男,台湾屏东人,文学博士,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禹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春秋》学、《左传》学、宋诗,等;

邱诗雯(1981-),女,台湾台北人,文学博士,成功大学中文系项目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史记、史传文学、古典散文、古典文艺批评、文献学、实用中文写作及华语文教学;

张瑞麟(1974-),男,台湾宜兰人,文学博士,成功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宋代学术思想、《群书治要》。

出版社)、《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荣获中华发展基金会资助。创立《宋代文学研究丛刊》,自任主编(1~15期),自1993年起,刊登宋代文学有关诗、词、文、赋、小说、戏剧、骈文、诗话、笔记之研究。又执行实用中文之科研计划,出版《实用中文写作学》6册、《实用中文讲义》2册。主编《文学艺术与创意研发》4册,《传统文化与经营管理》1册。邱诗雯、张瑞麟两位博士先后两次对高评老师进行了学术访谈,于2018年11月定稿。现将访谈内容归类整理,希望能嘉惠学林。

一、《左传》编年,以历史叙事解经,是研读《春秋》的基始

问:《春秋》三传历来各有拥护者,老师的看法如何?为什么选择《左氏》学作研究?

答:从郑玄以下,就主张三传要会通,不能专主一传,必须要兼通其他二传。三传跟《春秋》的关系,有点像一对父母生了三个小孩,三个小孩身上都能找到遗传自父亲的特质,譬如身材、个性、气质品味、胸襟气度,等等。《春秋》经有许多微辞隐义,比较不容易了解。透过三传有助于理解《春秋》经,犹如从三个小孩遗传基因去理解父亲。把三个小孩的特质加在一起,取其最大公约数,那么,父亲的音容笑貌、个性胸襟,应该约略可以掌握。所以我主张,治《春秋》,要会通三传。

不过,三传会通谈何容易?古人皓首才穷一经,何况三传?然专主一传,旁通参考其他二传,应该不难。《公羊》《谷梁》以义解经,以历史哲学解释《春秋》,就像报纸的社论,有既定的立场,能自圆其说,与《左传》以历史叙事诠释《春秋》不同。《公羊》《谷梁》解经,如果不参考《左传》叙事,等于说不知世界发生什么事,主笔也可以撰写社论。《公羊》《谷梁》的学者,研究以义解经、历史哲学,应该要多多参考《左传》的叙事,解经才更精确,历史哲学才更圆融。《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事件当中,就具备有哲理,事实胜于雄辩。事件本身弄得清楚,是非对错就可以明白。

我大学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左传》的任课老师是程发轫、刘正浩教授。刘、程二位先生,学养深厚,教学认真,引发我对《左传》的兴趣,让我有了一些基础。四年后,我重回台湾师范大学读博士班,原本计划研究全祖望的学术思想。当时,台湾师大没有理学的指导教授,我只好去请教黄永武教授。他说:“理学,我不懂。”不过,他有

一个心愿,想要研究中国的散文史,《左传》是中国很早的散文,又是优美的杰作,值得研究。那时,他当中兴大学文学学院院长,院务繁忙,问我是否可以帮他研究中国散文史开端的《左传》。我当然受宠若惊,老师把本来要写的题目让给了我。终其一生,我的作风也深受黄永武老师的影响,把日积月累得自别出心裁的题目,毫不保留地跟学生分享。就因为黄老师的期勉,所以,我就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左传》。

但《左传》面向多元,从《春秋》经的角度来看,是经学;就编年史的角度来看,是史学。《左传》还有若干天人消长的思想,以及一些先秦战国时期思想的源头,这些算是义理。我在《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自序》中曾提过,我的博士论文从文学角度看《左传》,有些人不以为然。孟子的《春秋》学曾经谈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其事是讲历史叙事,其文是讲史家笔法,其义是历史哲学。孟子认为《春秋》学应该是结合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一才算完璧。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左传》,所了解的是历史与叙事。这两个加在一起,进一步去了解《左传》的义,应该是非常好的准备基础。我的《〈左传〉的文学价值》《〈左传〉的文韬》《〈左传〉文章义法撷微》三书,都是从文学、文章学角度来看《左传》。但是,《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二书,已经慢慢从文学与历史的结合,迈进了《左传》的经学、义理研究来。这是我2010年以前研究《左传》的心路历程。

问:《〈左传〉之文学价值》曾经提示三十几种叙事笔法。这些笔法是得自您的归纳,还是前人古文义法的总结?

答:在《〈左传〉的文学价值》中,我提到了一些手法。谈《左传》的古文,谈骈体文,谈诗歌,谈神话小说,谈通俗文学,谈传记文学,谈叙事文,谈说话艺术,谈战国纵横的文风,谈描写文,或多或少都谈到《左传》的多元笔法。你所问的叙事笔法,跟《〈左传〉文章义法撷微》中所列立意、谋篇、安章、锻句、炼字,乃至风格种种,都是我读了很多关于《左传》的评点学著作,细心归纳得出的。只要台湾公立、私立图书馆看得到、书店买得到的,我都一一阅读,勤作笔记,分析归纳,最后得到结论。我的观点不敢说是古文义法的总结,应该看作文章作法的一种提示。《左传》是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上》推崇备至,所

谓“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堪称叙事文学的典范,史传文学的矩矱。所以,发现《左传》里面所呈现的史传笔法、叙事手法,甚至是文章义法所谈的详略、主从、重轻、虚实、曲直、显晦、先后、异同等等,在我看来,都要超出现在的修辞学、章法学之外很多。

细案所谓《春秋》书法,这些术语也都是关键课题。所以我曾经跟修辞学会、章法学会的朋友谈过,要发现新的章法学、新的修辞格,应该多多从古代的评点书中找材料,不要仅仅局限于陈望道的那三十几个修辞格。不只评点著作,诗话中也有不少,此外词话、文话、小说评点中都有。所以,我这小小发现,当然不会是古文义法的总结。因为只是归纳出所见,当然只是片段,不会是全面。如果我们能够考察古文的典范,求索《左传》《史记》的文章作法,从评点学、文话去做竭泽而渔的归纳,逐步进行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及各大古文学派的探讨,经过系统掌握之后,才能谈古文义法的大概。说穿了,古文义法其实就是文章的写作手法。

问:老师《春秋》《左传》学的研究,最大的心得为何?集中关注哪些议题?有哪些特色?

答:《春秋》《左传》学的研究,是一处宽阔的学术园林,一个漫长的学术旅程。《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是有关《春秋》学的第七本书。说实在的,对于《左传》,了解仍然有限,《左传》可供研究的实在太多了。到2010年为止,我对《左传》的研究大抵表现在专题导读、文学价值、兵法谋略、《春秋》书法与史家笔法五大方面。《〈左传〉导读》,近于专题导读性质。《〈左传〉之文学价值》《〈左传〉文章义法撷微》《〈左传〉之文韬》,侧重文学价值的爬梳。《〈左传〉之武略》,归纳战争个案,提示兵法谋略之大凡。《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谈据事直书、预言作用外,聚焦于《春秋》书法,以探讨《史记》笔法、宋代诗学、《春秋师说》《春秋孔义》、方苞义法及《春秋左传补疏》。《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亦以《春秋》书法为纲领,以研讨《左传》之诗化修辞,以叙事为论断,叙战资鉴之叙事策略;论证《史记》之诗歌语言、叙战义法;下探刘知几《史通》、杜甫诗史、苏辙《春秋集解》,见证书法、史笔、诗心之相通。现当代学术,则考察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钱钟书《管锥编》,以见左丘明与孔子、《左氏》与《春秋》之关系,而《左传》之书法、记言拟言代言之叙事艺术,亦可得而知。

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左传》,是我的特色。孟子谈到,《春秋》有其事、其文、其义。我研究文学,当然已经掌握了史事跟史文。这样,对于更进一步了解史义,大有利益,大有帮助。因为治学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比较容易达到圆融的目标。绝大部分的人研究《左传》,多直接从经学的角度切入。但是《左传》的属性,是以历史叙事来解经,毕竟事件是历史,表现的手法是文学,这方面如果不很了解,就直接去说历史叙事怎样解经,解释什么微言大义,容易引喻失义、游谈无根。不但精确度不高,而且常捕风捉影。我认为,事、文、义三者应相资为用,不能偏废。司马迁私淑孔子,典范《春秋》,《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因为“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所以,透过其文、其事来考察其义,比较“深切著明”。南宋胡安国,就是据此理念,著成《春秋传》,而对诠释《春秋》经贡献良多的。

二、会通诗史与研究创新

问:《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文史通义·史德》称:“必先通六义比兴之旨,然后可以读春王正月之书。”老师同时研究史传文学与诗歌,对于孟子与章学诚的话,是否有更深刻的体会与诠释?

答:孟子讲“《诗》亡,然后《春秋》作”,明显是在说诗歌跟《春秋》有着相同的特质,才能彼“亡”而此“作”。如果根据闻一多、朱自清的说法,“诗”的本义、引申义,就有记忆、寄托跟怀抱三个意思。从诗歌保存宗庙祭祀、朝廷燕飨、会盟征战,以及士人庶民哀乐情愁等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跟《春秋》为记事之书是相通的。黄永武教授以为《诗经》小序,跟《左传》的历史叙事可以相互补充。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跟《春秋》经有相通相融之处。诗与《春秋》如何相通?我写过一篇《杜甫诗史与春秋书法》的论文,论证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作叙事歌行,多运用《春秋》书法来叙次史事,褒贬人物。杜甫书法之渊源,来自十三世祖当阳君杜预。可见,到了唐代诗与史都还相通。乐府诗是叙事的,叙事诗就更接近原始诗的属性,所以,诗歌中有许多与《春秋》书法相关。我另一篇论文《刘知几之〈春秋〉〈左传〉学——兼论诗化之史学观》,论证《史通》对《左传》诗歌语言的提示,诗与史可以相通为用,又得一信证。在《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这本书中,我提出三篇论文,谈宋代诗学跟《春

秋》书法、史家笔法的关系。由此看来,原来,诗与史就相通,即使后来诗与史各自分行、各自独立,其相通的属性犹存。

1985年,我来到台湾成功大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开授“文史综合研究”必修课程,指定硕士生研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对于其中文学与史学的会通,特别关注。由于研究《春秋》《左传》,所以对其中提及文史及经传材料,特别注意。《文史通义·史德》说:“必通六义比兴之旨,然后可以读春王正月之书。”叶瑛的注释,未说明;研究章学诚学术的专家,也未见关注着墨。因为,这句话牵涉到《诗经》学和《春秋》学两大专业领域,必须进行会通整合,取其交集,所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章学诚精通文史,这两句话,应该有其可信度。“春王正月之书”,指孔子《春秋》经。读得懂《春秋》经的先决条件,必先通晓《诗经》学的比兴寄托。比兴,是《诗经》创作的手法之二,后来发展成为兴寄,陈子昂、杜甫、白居易都主张作诗要用比兴寄托。通晓《诗经》的比兴妙旨,有助于解读《春秋》经的借事明义,藉其事其文以见指义。董仲舒说《春秋》可以决狱,就是用比兴的方法。虽然历史不会再现,但是事件却可能重演。历史资鉴就是应用模拟推理。“兴”是联想法,就眼前事件联想到《春秋》经文,就其相似之处加以模拟。明代晚年的红丸案,国君因食物中毒而身亡,类似《春秋》经所记:“许世子弑其君。”红丸案发生时,《春秋》学者、朝廷谏官,都拿《春秋》经“许世子弑其君”来影射这件事,这就是比兴寄托。胡安国《春秋传》,作于南宋之初,因激于时事,故语多感慨。《春秋》载:“纪侯大去其国。”胡安国不同意纪侯去国而不存;“荆以蔡侯献舞归”。《胡传》贱其亡国失地。要皆就古今类似事迹,作联想比况,以寄托怀抱。历史学界常说:“所有的历史都是近代史。”大抵是就比兴寄托来说的。这个课题,学术界着墨不多,应该多多从《文史通义》的命题去探讨申说。这是学科整合的好题目,对于《春秋》学的诠释,以及史传的解读,当有贡献。

问:关于整合诗学与史传的研究,最值得关切的文本是叙事诗、咏史诗还是其他?

答:关于诗歌跟史传的整合,叙事诗跟咏史诗当然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重要而值得关切的,就是《春秋》书法与史家笔法。在中外、古今的文学中,在政治高压统治的时代,通常会失去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书写自由。这时候,为了避免

触犯忌讳,文学的书写方式往往暗合史家笔法与《春秋》书法。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既要忠于历史客观,又要避免得罪汉武帝,下笔当然要多做斟酌。鲁定公、哀公时代,就孔子而言,是现代史、当代史,当权派都还在。孔子作《春秋》,下笔时不得有所顾忌。所以,他运用《春秋》书法,委婉含蓄地反映历史真相,而且其中还要寓托褒贬。同样的,谈到清朝统治,或者是元朝统治的时代,中央专制集权,文人因应时代剧变,无论作诗、写文章、写小说,不约而同就会运用书法或史笔。这方面,可以多多探索。

刚才提到诗歌与史传的关系,的确如咏史诗、叙事诗,还有乐府诗、讽喻诗,通常以事件的描述为主,可以去着墨。还有明末清初所谓的诗史,一定跟史传、书法史笔有关,学术界对这点关注不多。研究文学的人通常不研究历史,也不兼顾经学。研究经学者,可能研究《诗经》,但是不见得涉猎《春秋》,也不会注意三传,所以,对《春秋》书法可以说是比较陌生。研究诗歌者很少同时研究史传,所以对史家笔法、《春秋》书法体现在叙事诗、乐府诗、咏史诗中的现象视而不见,值得学术界关注。如果要保证不会踏空的话,最好就是找一些史学家所作的咏史诗。当然,这跟所探讨的专家诗人,是否同时具备书法素养、史笔专业有关。历代都有国史馆,在国史馆担任过史官的诗人,因为他有纂修历史的经验,应该知道什么是《春秋》书法。对于敏感事件、忌讳问题如何处理?如果退而作诗,就比较可能流露专业。大家不妨去注意曾经当过史官的历代诗人,研究他们的叙事诗、咏史诗、乐府诗。有些《春秋》学家,也有诗集传世。所作叙事、咏史、乐府诗,是否也有《春秋》书法,或史家笔法的表现,这也值得注意。

问:老师所作《〈史记〉的诗歌语言》《杜甫诗史与〈春秋〉书法》等论文,跨际研究,同时兼备两方面的专长。如何养成这样的法眼,才可以看出文史会通之轨迹?有没有哪些入门必读的书籍或刊物?

答:诗歌与史学、《春秋》学间的跨际整合,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按部就班、盈科而后进的。我的硕士论文研究史学家黄宗羲,论文涉猎所及,自然得懂一些史学。博士论文研究《左传》,既是史学、也是文学,更是经学。紧接着承蒙黄永武教授抬爱,与其合作撰著《唐诗三百首鉴赏》,从此踩进唐诗的殿堂。1985年,应征到台湾成功大学,又

奉黄师旨意,筹编台湾版全宋诗,于是又进入宋诗、宋诗话的门户,从此与唐宋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截至2010年,出版有关唐宋诗的论著共八部。由于有研究唐宋诗这样的心路历程,因此,就容易看出诗学跟史学,以及《春秋》学的关联。可见,学养的积累,最好稳扎稳打、盈科而后进。真积力久,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因为研究者同时具备史学、诗学、《春秋》学的素养,考察问题,就比较会作创意解读,自然会从诗歌语言的角度去考察。看杜甫的诗歌,尤其是叙事歌行,就会运用“异域之眼”的特识来探究,发挥会通化成的梅迪奇效应(Medici effect)。

杜甫诗歌既然被称为诗史,明显跟史学有关。孟棻的《本事诗》谈杜甫所作安史之乱前后的诗歌,提及“《春秋》推见至隐”这个关键术语。如果富于《春秋》学素养,就会知道,这句话典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跟《春秋》学有密切之关系。杜甫十三世祖,为当阳君杜预。于是从孟棻《本事诗》所提“《春秋》推见至隐”,联结到司马迁《史记》典范《春秋》,再从《史记》典范《春秋》,类推到杜甫《祭远祖当阳君文》,再推拓杜甫叙事歌行,于是撰成《杜甫诗史与春秋书法》一文。就因为具备《春秋》的素养,是有“先验”做基础的,所以看到杜甫诗歌时,自然而然从《春秋》学的角度来考察探究一番。这种水到渠成、植基于积累的功夫,先验与新知互相碰撞,往往激荡出独到的创意。

这方面有哪些入门必读的读物?基本上没有。如果有的话,表示这是一般的题目,学界有人耕耘,有人探讨过。起码是个半生半熟、被人家开拓过的领域,才会有所谓必读书目。我做研究,喜欢尝试陌生,挑战一些人家没做过的论题。所以,除了自己写过的书目以外,基本上没有相近、相似的论著,何况相同?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要看什么叫作诗歌语言、文学语言?然后去看什么叫杜甫诗史,什么是《春秋》书法。但把这两个领域会通整合在一起,就少之又少,几乎没有。

问:老师有几篇专文,提供100多则的《春秋》经传研究多样性选题。何以如此大方地公开研究构想?这些文章对学界是否造成一定的影响?

答:在台湾《汉学研究通讯》《文与哲》以及大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先后刊出三篇有关《春秋》经传研究选题的论文,的确产生很多回响。台湾有没有反应?不确定,但在大陆,的确造成了不小的回响。我常常接到一些素昧平生研究

生的电子邮件(email),问我这个题目怎么做?或者是参加研讨会时,常常有人拜访,也是从未谋面的。所以这些报导,的确发挥了影响。像有一年在北京香山大饭店,就有北大的三位博士生,登门讨论;在四川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位博士生远从湖北来跟我谈《春秋》书法。后来,他们都各自完成了博士论文。其中一位是研究清代《左传》评点学,一位研究《春秋》书法与中国文论。还有一些受到提点,陆陆续续撰写博士论文,完成以后,都从大陆各地寄来,告诉我,因为他们看了那几篇论文,受到启发而完成了著作。

《春秋》经传多样性的选题,其实不算研究构想,而是阅读札记。从读硕士开始,我就有一个习惯,读书的时候,觉得这个题目值得研究,就随手记录。后来稍加整理,从枝节的题目变成有机组合,变成中型的课题。再把中型的题目汇集起来,就成为比较宏观的大型专题。这种大型专题,可以提供我们执行两年、三年、五年的研究。刊登在期刊里面的三篇论文选题,大概80%以上都还没有人做过,是陌生的、新鲜的。学术是一种公器,没必要据为己有。既然发现这些题目值得做,那就公诸于世,大家一起来研究,不是很好吗?何况《春秋》学这个领域,在21世纪经学算是冷门,在大陆可能稍微热络一点。如果是冷门,很需要鼓励,就算热门,也需要加持啊!这些题目的提出,希望能够激荡出研究的火花。学术研究,希望大家共襄盛举。众志成城。至于这些题目值不值得做,要怎么做?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家有兴趣,欢迎跟我讨论。我打算出版一个选题学的专书,主要就是针对我所专长的《春秋》经传、《史记》学、宋诗、宋代诗话,列举专题研究选题,每个题目都做100~300字的解说。这样的做法,应该算是一种创举。

三、建设自信,是持续研究的推力

问:老师《春秋》《左氏传》与唐宋诗、诗话学的研究,均有多元的角度与创新的独到见解。是什么原因,让老师对学术研究持续抱有这么大的热情?

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最主要的是勇于将自己推向舞台,展现自己的研究心得,建立自信。论文发表,最好是已准备好了,难得有机会来宣传、广告自己,准备好了,再上场。先建立自信,就能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与肯定,而后就能生发信心。有心得,有挑战,就有乐趣,就有推力继续做学术

研究。换言之,后续效应是,学者们主动认识你,尤其是知名学者的惺惺相惜,产生涟漪效应。研讨会自然邀约不断,研究也就持续拓展加深,成果自然更加可观。做学术研究,建议要找寻规模大一点的研究领域,细心专注阅读文本,从中提炼专题,然后参加研讨会。这样规划,最大的效益,是在论文次第完成之后,容易结集成书。我的专业领域多,就是这样规划的。我做学术研究,都有规划。书籍出版流通,研讨会就会邀约不断。而在学界邀约中,就拓展了领域,也是建立自信的方式。论文修改后,再投寄到学报期刊。接受刊登,又是另类自信的确立。

四、持续性的研究,新领域的拓展

问:老师近四年来,在《春秋》《左传》领域的研究,有更新的展现。延续性的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各为何?何以有这样的创新思维?

答:2010年以前,我出版两本书,一是《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另一是《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又有《杜甫诗史与春秋书法》一文,都在谈《春秋》书法。比较侧重的是,《左传》所运用《春秋》书法的一些状况、层面。杜甫这篇,提到的是叙事诗运用《春秋》书法的情形。所以,一个是《左传》,一个是杜甫诗,都是对《春秋》书法有一些后续探讨。

新方向的开拓,主要研究孔子所作《春秋》。研究《春秋》三传以下,包括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历经六朝唐宋元明清,《春秋》学者怎样诠释解读孔子《春秋》经。换言之,是针对孔子所写的一万六千多字的《春秋》,如何做经典诠释的问题,研究重点在谈《春秋》书法。以前研究文本是《左传》,是叙事、歌行,现在是孔子参考鲁史而写成有独到、有别裁、自成一家的历史哲学,即所谓的《春秋》。研究聚焦在《春秋》一书的书法,即写作手法。

书法有内容思想,即义的部分;有形式技巧,就是法的部分。义法这两个字,司马迁最先提到。文学作品,靠作家创作,历史需靠史料编纂。孔子根据鲁国历史编纂成一部《春秋》,司马迁利用金匱石室之书,写成一部《史记》,其中有史学家的别识心裁,这就是“义”。研究孔子如何写作《春秋》?就是探讨创作论。读者怎么解读《春秋》,始能晓得微辞隐义的言外之意,这是阅读论。《史记》、三传对《春秋》如何诠释,才比较主观,才能萃取别识心裁?中唐啖助、赵匡的新《春秋》学派,宋元明清的《春秋》宋学,对《春秋》又如何诠释?这是“诠释

法”。以上所谈《春秋》书法,有别于以前只锁定《左传》所作之研究。

孔子笔削《春秋》,历代学者如何解读、诠释?这是研究重点。《论语》称孔子“述而不作”。“述”是引述前人所言,是继承,所谓“作”,即是创作,即是无中生有,乃发明之意。孟子《离娄》所谓“作”,绝非随意。又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即明示创作《春秋》三元素:为其事、其文、其义。合其事与其文,谓之法。合三者而一之,即是义法。《礼记·经解》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事,相当比事,其文即是属辞。属辞比事,为何是《春秋》之教?透过属辞,藉由比事,可以求得《春秋》的微言大义。何谓属辞比事?属辞,是连接先后的文辞,可以看出《春秋》的微言大义。比事,指排比事迹,把前前后后不同的事迹排比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孔子的言外之意。

譬如《春秋》“弑君”之书法,《春秋》共记鲁君十二,除鲁哀公外,十一位国君的去世,依例当书“薨”。国君死于皇宫之中,属于正常死亡者,有八位,《春秋》皆书地点,称薨于“路寝”、薨于“正寝”。但有三位国君书法异常:鲁隐公只写“公薨”,底下没有记载地点。另外,闵公也是写“公薨”。经过事迹的排比,发现“君薨”的书法属辞不同:以臣弑君,以下犯上,不可为训,故只写“公薨”。鲁桓公死,《春秋》书“公薨于齐”。鲁君何以死在齐国?原来夫人文姜与齐襄公私通、乱伦,被鲁桓公责备,因而被齐国所杀。此事使鲁国蒙羞,却不可不载,孔子斟酌以为当为君者讳,为亲者讳,乃如此记载。因此,透过其事、其文,即可了解其义之所在。另外,透过属辞、比事,可以看出其义之幽微。再举关于鲁君结婚的书法。孔子所作《春秋》,婚姻正常,第一夫人循规蹈矩,通常不记,所谓“常事不书”。反之,反常则书之。鲁君娶齐女,《春秋》必详书之。清代学者张自超就指出,孔子很厌恶齐女,以为好色荒淫、嗜杀成性、乱国乱政。何以知之?张自超掌握《春秋》全书,排比相关事迹,连接前后文辞,于是发现言外之意:齐女乱鲁,引发孔子厌恶。

三传都自认解释《春秋》是最佳诠释,如何判准?庄子于濠梁之辩有言:“请循其本。”研究《春秋》三传,也该追本溯源,回到《春秋》本身来掌握。掌握本始,则因革损益,自能厘清。以后的纷纷扰扰,也不难考索。

五、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

问:对《春秋》书法的探讨,老师除“以传解经”外,已经跨领域到文学叙事。可见对叙事艺术的关注。这与后来聚焦“比事属辞”,有何关系?

答:以往研究都以《左传》为主,出版专书都以历史叙事视角来看待《左传》这部经典。至于《西厢记》笔法通《左传》这篇文章,从历史叙事,转变一个方向,《左传》可以是文学叙事,跟《西厢记》的文学叙事,可以相通相融。最近发表十六篇论文,主要诠释孔子《春秋》的经学叙事,则从文学叙事变成经学叙事。不管是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经学叙事,研究都聚焦在“比事属辞”上。掌握“比事属辞”这个多功能钥匙,就可以研究春秋书法、史家笔法、传统叙事学、古文义法。

《春秋》经的元素是其事、其文、其义,其文则史,是史家的文笔。通常一些史书,都是优良的文学作品,像是《左传》《史记》。所以,我从文学的角度进入《左传》的学术殿堂,跟上古史的专家纯粹从史事的角度去看《左传》,以及经学家只看到《左传》解释《春秋》经,这是不同的。但就传统叙事学而言,《春秋》的三大元素,跟《左传》的三大元素,其事、其文、其义,并无不同。我的博士论文,以及在2010年以前的研究比较偏重《左传》的历史叙事。《左传》的历史叙事就包含两个,第一个是文学的部分,是“其文则史”的部分,也就是属辞的部分。透过其文,透过属辞,不难知道事件报导,因为事跟文是合而为一的。不管是孔子或左丘明,《春秋》或《左传》成书后,一般人看到的是其文,从其文容易推敲出其事。

我最近完成一篇论文,名为《书法、史学、叙事、古文与比事属辞——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理论基础》,2017年1月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学报》。这篇论文,对于刚才所说,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观照。孔子的《春秋》经,应该是中国叙事传统的源头,所谓的经学叙事。《左传》解释《春秋》,以历史叙事来解经,是从经学叙事演变为历史叙事。司马迁从历史编纂学来说,他学习孔子和左丘明。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慢慢地从历史叙事兼顾文学叙事。《史记》因为历史叙事兼顾文学叙事,于是成为后世志怪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明清小说的源头。至于《春秋》的经学叙事,司马迁则是涵泳摄取,内化为“制义法”之利器。

六、称属辞比事,盖从俗;称比事属辞,乃从实

问:比事属辞在整个叙事学的诠释过程中,位居枢纽地位。这个书法术语,究竟叫属辞比事,还是称比事属辞?概念的内涵有何重要性?

答:《礼记·经解》提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从汉朝开始,历代学者谈到这四个字,通常使用属辞比事。历经六朝、唐、宋,直至宋代张洽作《春秋集注》,首先用“比事属辞”。其后,至清朝时方苞的老师张自超,不断在著作中谈到“比事属辞”。方苞受《春秋》学于张自超,所以方苞在《春秋通论》与《春秋直解》中,皆用“比事属辞”。章学诚为乾嘉史学家,《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提到这个术语十余次,都使用“比事属辞”。嘉庆年间的张应昌,著有《春秋属辞辨例编》,也再三提及“比事属辞”。换言之,称为“属辞比事”乃既定的习惯,是从俗;若称为“比事属辞”时,是根据历史编纂学的实际状况而言,是从实。何以认为比事属辞比较精确呢?我的新著《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义以为经,而法纬之”,这是方苞“义法”说的经典名言。为文之道,未下笔先有意;犹绘画之道,必先成竹于胸中。孔子作《春秋》,未下笔之际,于编纂史料的同时,已确定褒美或贬刺,这就是“义”。方苞所谓“义以为经”,犹言“义以为先”;“而法纬之”即是“法后之”的意思。因此,法是因为义而起的,法常随着义而有所改变。

例如,孔子对于鲁君娶自齐国的夫人,深恶痛绝。因为根据鲁国史料,这些齐女,一个比一个淫乱,一个比一个好杀成性。因此,对于娶自齐女,孔子应该先有讽刺之“义”,然后记鲁君娶齐女时,才会如实地记述呈现。至于鲁君不娶自齐女,表现正常而合礼,则《春秋》根本不记载。比事之时,取舍之际,已确定写作意图。属辞之时,修饰润色,又作第二步确认。记载的称为“笔”,不记载的称为“削”。笔、削即是在下笔之前,甚至在收集材料的当下,就大抵确定了。所以,《春秋》之作,先有“义”,之后再有“法”。“法”就是材料的收集、排比,文辞的修饰、润饰,这是因义生发的。由此可见,要写《春秋》《左传》《史记》,甚至写一篇文章,都应该“未下笔先有意”。

又譬如司马迁《史记》要写《淮阴侯列传》,在开始收集资料、未下笔之前,已经决定其“义”。其“义”,要为开国功臣韩信冤狱平反。官方档案记述韩信被杀,乃是背叛刘邦,意图谋反。不仅被杀,还惨遭抄家灭族。然而,司马迁掌握多方资

料,发现其实不然。因此,在“义”已确认下,取舍史料,修饰文字,必以平反之意依归,详略、重轻亦据此调配。《淮阴侯列传》开篇记载韩信三件很不名誉的事情:寄食亭长、漂母送饭、胯下之辱。呼应后文韩信回到淮阴,有恩报恩,以德报怨。由此刻画韩信为人。刘邦任用韩信,以为大将,解衣推食,言听计用,终为齐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则韩信当忠心耿耿,感恩图报,可以想见。拥有三寸不烂之舌的蒯通,游说韩信背叛刘邦,自立为王,明指“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韩信依旧忠心。司马迁下笔写《淮阴侯列传》之前,就先有上述的“义”,然后排比材料,再用文辞修饰。例如,韩信被杀后,司马迁写刘邦“且喜且怜之”。五个字表现出历史的真实,即是用“属辞”来烘托韩信的忠心。刘邦询问吕后,韩信临终前有何言语?吕后回应,韩信说:“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出自夫妻间的对话,更可见韩信未尝背叛了。这些都是“属辞”的展现。总之,先有比事,才有属辞,从比事可以看出义,从属辞更可以表现义。另外,整部书合观,掌握笔削、比事、属辞、探究终始,都可以看出“义”。

七、从经学解读与文学诠释,看方苞古文义法

问:近年来的研究,老师特别关注方苞。何以方苞是如此的重要?

答:最近出了一本书,《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方苞,是经学家又是古文家。但学界的刻板印象,多认为他只是古文家。然而,他的古文成就并未普遍受清朝人推崇。包括其传人姚鼐,对方苞的古文也有一些微辞,更不用说乾嘉时期的汉学家。因为汉学宋学是对立的,他们从汉学的角度去看宋学,怎么看都不对。但是,汉学在乾嘉势力中如日中天,所以宋学几乎被淹没了。方苞受到汉学家批判,对古文成就存有争议。他的宋学色彩也备受质疑,被视为不学无术。方苞有四本《春秋》学著作,《春秋通论》《春秋直解》《左传义法举要》《春秋比事目录》,并且在乾隆时期任礼部要职,关于《礼》学的著作有七八本,这不算经学家吗?《四库全书总目》提到他以属辞比事来解读《春秋》,四库馆臣是推崇的。方苞治《春秋》,提出笔削的观点,馆臣亦加以肯定。

方苞 49 岁开始研究《礼》,紧接着就研究《春秋》。他用属辞比事的方法推敲孔子《春秋》经的微辞隐义。又发挥属辞比事的方法,来研究《左

传》《史记》《汉书》《新五代史》等史传文。换言之,方苞是经学兼文章的,是从经术入、从文章出,两者兼而有之。我研究方苞,方法比较特殊,并不专谈古文义法,而是从比事属辞的经学基础去谈古文义法。《春秋》书法如何影响古文义法?共计有四个要点:其一,笔削取舍,演变为古文义法,就是叙事艺术的详略互见;其二,春秋书法的比事措注,演变为先后位次;其三,约文属辞,派生为虚实;其四,为张本继末,探究终始。

问:对古文义法的理解,一般多是从古文辞章的角度切入。老师的研究,却从《春秋》经学谈起。如此解读,显示什么重大意义?

答:方苞《又书货殖传后》云:“《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这里涉及两个部分,一个是《春秋》,一个是古文。义,指言有物,内容思想。法,指言有序,指形式技巧。接着又提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义,先有;法,后起。义与法搭配相成,就成为一篇文章。方苞从《春秋》谈到《史记》,再从《史记》讲到古文,因此,提示了《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古文义法,叙事手法发展的一个历程。法,即是其事其文,就是属辞加上比事。依照历史编纂学来说,指义是发想,其次有比事,其后有属辞;先有其义,次有其事,再有其文。方苞云:“法以义起,法随义变。”《史记·高祖本纪》叙刘邦之为人,“豁达有大度”。司马迁属辞比事用互见法,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表现刘邦的负面人格:苛刻寡恩、忌才畏能。司马迁先掌握高祖的真实性情,然后取舍有本,属辞有据。司马迁用这种方式,表现真正的刘邦,书写信史和实录。这就是先有“义”,然后找材料(其事),再属辞。再如《陈丞相列传》写陈平,其义在为阴谋家作传,于是其事的取材,其文的修辞,都随“义”而来。由此可见,不论是《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古文义法,或者是叙事技巧,比事属辞都是开启研究殿堂的一把钥匙。

孔子作《春秋》,历代有很多论述。论述切当精准与否,是可以检验的。《三传》解经是否自由心证,还是有所宗法?可以利用比事属辞作为标准,来进行检验。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为《公羊传》诠释解读《春秋》书法,已作最早而绝佳的示范。因此,比事属辞,确实可作古文经《左传》,今文经《公羊》《谷梁》是诠释《春秋》的一把锁钥。

八、“以经解经”的理念与局限

问:《春秋》微辞隐义迷茫难明,历来研究多参

《公羊》《谷梁》《左传》。“《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以经解经”理想,是否可行?其困境是否可藉由跨领域的视野来突破?

答:探索《春秋》的微辞隐义,如果善用“比事属辞”之诠释法,百分之九十可以透过“以经解经”来完成。但仍有百分之十左右,必须仰赖三传来厘清、补充、印证。所以,《春秋》三传不能完全束诸高阁。如何“以经解经”?门径有四:笔削、比事、属辞、探究终始。比事、属辞,前已详说,不赘。就笔削而言,我发表《笔削显义与胡安国〈春秋〉诠释学——〈春秋〉宋学诠释方法之一》一文,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春秋》经过取舍、笔削,看似“断烂朝报”,如果贯通全经而观之,却可以“互发其蕴、互显其义”,于是微言大义就显示出来了。例如,《春秋》内辞、外辞书法不同;书鲁君被杀与正常死亡,书法亦不同。其间有详略、有异同,互相比较,即可互显其中意蕴。

又如,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云:“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载。”张良献策,关系到汉朝的建立,所以《留侯世家》中记载楚汉相争,与兴亡攸关的就记载,反之则删略。记载谓之笔,删略谓之削。《萧相国世家》言“非天下之功,不记”,道理一样。除此之外,还有探究终始。韩愈《赠卢仝》诗已经提示了“究终始”,就是以系统思维来看《春秋》。方苞《春秋通义》所谓“按前后而考其义例,则表里具见”“通全经而论之”。前文举内辞书弑君,鲁君娶齐女,就是运用“究终始”之法。

问:老师探讨问题,并非简单概念的稼接,而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寻求突破。例如,以胡安国《春秋传》作为解析对象,试图由叙事艺术切入经学诠释,此中构想如何?

答:关于胡安国《春秋传》,已发表一篇有关笔削的文章。另外,还有八个主题尚待完成。胡安国的《春秋传》影响巨大,不仅上承孙复、程颐的《春秋》学,往下开启朱熹这一派的《春秋》义理学、性理学,甚至影响了元明。我持“以经解经”方式来看胡安国的《春秋》学,运用“比事属辞”之书法来进行解读。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以“六艺比兴”诠释《春秋》。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提示:“必通于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意即必须通晓《诗经》中的比兴,才能解读《春秋》经,这成为诗学与《春秋》学的整合研究。这命题,适用于胡安国《春秋传》。

九、化解争议与规划未来

问:在汉学视野下,考据学家钱大昕对方苞进行了批判。如何看待或化解这种立场分歧下的学术争议?

答:这个问题,千古难解。如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甚至于古文中也有秦汉古文、唐宋古文之争,就“争”而言,容易流于意气。宋代党争的人物,一个比一个聪明,如司马光、苏轼、程颐,在卷入情绪之争后,都是意气用事,不可理喻。先入为主,锁定其一,排除其余,如何能客观持平?只有平心、静气、客观、理性,才能够欣赏他人的成果,才能沟通。

以宋诗来说,面对质疑,我尝试建立一个客观衡量的标准,适用于宋诗,也适用于唐诗、六朝诗、《诗经》,甚至于西洋文学。此标准即是诗歌语言(好诗的标准)。面对三传纷争时,我也尝试找寻一个标准来进行检验,今天所说的比事属辞,就是以客观的标准来分辨。对于讨论是非曲直,名作家陈之藩称:“理直而气和,义正而辞婉。”可作典则。

问:学术研究贵在有延续性,对于未来的研究规划,老师的学术触角将伸向何方?

答:现在最想完成的,就是《史记》的叙事传统。2017年1月20日,香港中央图书馆,我有一个新书发表会,是有关《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的心得分享。我强调:“比事属辞”的诠释法,是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一把钥匙。三民书局跟我约稿,要写一本《史记》的论著,已经完成了八篇论文,每一篇都在三万字左右。叙事传统,是其中的亮点。规划中还有两篇未完成,主要谈《史记》与《左传》在叙事传统上的关联。其一,《史记》绍续《左传》的叙事传统,属于传承多于开创部分。加上司马迁《史记》如何开创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而影响到后代。我要在《春秋》《左传》研究的基础上,谈“《史记》纪传与叙事传统”,尤其是叙事传统部分,来与西方对照。

目前,大家谈所谓中国叙事传统、叙事学,都是乞灵西方的叙事学。而西方的叙事学,是从小说叙事学演化来的。西方叙事学,较强调“事”;而中国传统叙事学较关注“叙”。小说叙事学可以用来研究《春秋》吗?可以用来研究史传的《左传》《史记》吗?恐怕不行。中国既然有自己的叙事传统,从《春秋》《左传》《史记》,一路下来,一直到方苞古文义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而集大成,我们为什么不加以运用?因此,我打算推广中国之

叙事传统。这本书如果完成,将成为我推广中国叙事传统、研究史记,甚至于史传的发始。

第二本书,打算完成《比事属辞与历史叙事学》,已经发表了五篇论文,预计再撰写两篇,就可以结集成书了。第三本书,是《比事属辞与经学叙事学》。这方面,已写作了八篇论文。《谷梁传》“曲笔书灭”与《左传》“直书灭国”两篇完稿后,共有十篇,经学叙事学就完成了。

延续以往之论文选题研究,目前次第完成的,是《论文写作的策略》(暂定),已经写好十一篇文章,约10万字,剩下三篇待作。另外,念念不忘的是从文学艺术中提炼创意、从传统文化来谈经营管理。面对社会实用的要求,将创意转移到产品之开发,将文化转变到经营管理上。

(责任编辑 张东茹)

Thought of Researches of the Classic and San Chuan of Chun Qiu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ng Gaoping

ZHANG Gao-ping, QIU Shi-wen, ZHANG Rui-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pei 701,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Chang Kaoping has been studying *Chun Qiu* and *Zuo Zhuan*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 has published 9 related monographs and more than 80 papers. In the first 30 years, professor Chang has mostly focused on discussing the text of *Zuo Zhuan*. He examined the literary value of *Zuo Zhuan* and the usage of the writing method used in *Chun Qiu* in the aspect of yi (words with rich meaning) and fa (expressions with fine arrangement) in the ancient writ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classics through history. For the recent 10 years, Professor Chang has realized the main points of words connection and event arrangement, and has been able to explain the hidden meaning of Confucius' writings in *Chun Qiu*. The main points hold the hint of arranging the sequence of ideas of Chinese narration tradition.

Key words: *Chun Qiu*; *Zuo Zhuan*; yi (words with rich meaning) and fa (expressions with fine arrangement) in the ancient writing; explain the classics through History; narration tradition

栏目更名启事

为了提高办刊质量,适应学术发展需求,构建时代文化精神,《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重点建设栏目“宗教学研究”,自2019年第1期更名为“儒释道与传统文化”。敬请广大学者、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本刊、本栏目。

宝鸡文理学院杂志社